

孟二冬 著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编
国学研究丛刊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编
国学研究丛刊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孟二冬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孟二冬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9

ISBN 7-301-03590-X

I. 中… II. 孟…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 207.22

书 名: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著作责任者: 孟二冬 著

责任编辑: 乔征胜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590-X/I·4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275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国学研究丛刊》总序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袁行霈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应当清醒地看到: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何况国学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研究国学不等于复古,研究国学不应当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伟大创造,是一种从未中断过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它有辉煌的历史,曾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它的优秀部分至今仍然散发着魅力,我们应当自觉地继承。近二十年来国学研究的进展已经证明,只要踏实认真地进行研究,是可以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广大群众认可的,是可以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为弘扬民族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的。

我们现在研究国学,一定要有全球眼光,也就是把国学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实际的情况恐怕更值

壹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国学研究丛刊》总序

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世界更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有人问我:研究人文,究竟有甚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关于国学研究,也可以从这方面考虑。

北京大学在1992年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于2000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院。这是一个虚体性研究机构,我们以“虚体办实事”为宗旨,遵循“龙虫并雕”的方针,既从事和组织高深的学术研究,又注意做好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除了编辑《国学研究》、《国学研究丛刊》、培养博士生等日常性工作外,还曾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召开过有17个国家的一流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文化的馈赠》四卷,以及《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五卷。我们还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拍摄了100集电视专题片《中华文化讲座》,在美国播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150集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在不止一个频道多次播出,并出版了讲稿《中华文明之光》,面向少年儿童的彩图本《中华文明大视野》获得国家图书奖。

《国学研究丛刊》是由北大国学研究院筹划编辑的,从1993年起陆续出版了13种。这些书都是我们资助研究或资助出版的,其中不乏名家的名著。现在北大出版社准备继续与北大国学研究院合作,用《国学研究丛刊》这个已经在读者中建立了信誉的名称为号召,向国内外学者广泛约稿,严格审阅,精心编辑,以崭新的面貌跟读者见面,使之成为足以代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水平,并能反映国内外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前沿的精品。我很赞赏出版社的这个设想,希望出版社持之以恒,不断推出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佳作,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必可蔚为大观。

北大出版社要我为这套丛书撰序,姑且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了下来,希望得到同道的响应。

2006年2月7日

丙戌岁元月初十

叁

《国学研究丛刊》总序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序

孟二冬博士是和我交往最久、关系最密切的一位青年学者。1981年,他从安徽负笈北上,以进修教师的身份踏入北京大学的校门,跟我研修唐诗。当时我并不了解他,只觉得他沉默寡言,笃实好学。寒假前,他交来一份关于韩愈古文的读书报告,我很赞赏他能拈出“文气”二字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范畴进行探讨。当时我正有兴趣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结合起来,文气论作为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便约请他和我一起进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就是以韩愈为中心,溯本追源,从“气”的本义开始考察,对历代有关“文气”的原始资料,一一加以搜集整理,以期找到文气论的发展脉络。他当时并没有对我的想法表现出十分的兴趣。想不到两个月之后,他送来一份数百页的资料长编,不仅包括了文学,而且涉及哲学、音乐、书法、绘画、医学等领域。一个人在承诺一件事情的时候,话是如此之轻,以至不敢确定他是否真的想做;而在做的时候却肯于花如此多的气力,以至深怕他过于劳累,这样的人太值得信任了。我们在这份资料长编的基础上,拟定了文章的框架,由他写出六万余字的初稿,经过我两次增删修改,提炼出几个重要的结论,终于完成了一篇将近四万字的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来北大访问,恰好和我讨论文气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有一篇长文快要完成,以后会寄给他,向他请教。他对我们的论点和论文的写法很感兴趣。遗憾的是,当这篇文章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发表的时候,刘若愚先生已经溘然长逝。我之所以在这里不惜笔墨重提此事,是想重申: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也许正是这篇

壹

序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文章,奠定了孟二冬博士的研究基础。此后,我一再告诉他,一个学者至少要有两块园地,研究文学史的人如果能够兼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出入于两者之间,所做出来的学问将会达到一个新的境地。

1985年,二冬第二次跨进北大的校门,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当第三年确定论文题目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选定了韩孟诗派。他的硕士论文——《论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得到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他的答辩胸有成竹,十分流利,和平时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这篇论文很快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1986年第6期),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占据了学术前沿的优秀论文。特别应当提出的是,这篇论文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文学与哲学、艺术学、心理学互相打通,是我在1979年提倡过的那种研究方法的成功实践。

二冬取得硕士学位后,到由北大支援的烟台大学工作了三年。1991年,他以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三进北大,那年他已经三十四岁,和十年以前初进北大相比,已经成熟多了。他仍然以韩愈为中心,进而将研究的范围扩展为整个中唐,对中唐七八十年间诗坛的面貌、诗人的心态以及社会的风貌做了多方面的考察,终于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唐诗歌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论点。论文几经修改,定稿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掩卷沉思,感到这位青年学者在十几年内跨出的步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唐诗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关于这篇论文的具体论点和精彩之处,已见于此书的提要和结论,无需我再赘述。我想说的有两点:一是将文学与其它邻近学科互相打通,进行综合研究,这种方法是富有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的。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需要有广泛的文化素养,既站在文学的本位,又要有哲学的思维、艺术的感受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实在是不容易驾驭的。第二,注意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并且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作为研究对象,这是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动向。这也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将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文学家们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考察,既注意他们的时代共性,也注意他们的个性差异,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得出新颖的结论。孟二冬博士的这篇

论文,可以说反映了目前学术研究的两个新的趋向。任何一篇论文所提出的论点,都不一定能得到学术界所有人的赞同,但是二冬在以上两方面的开拓,是无论谁也不能忽视的。

二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也一直鼓励他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结合起来,在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点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21世纪的学术之路将更加艰难,任何一点进展都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二冬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他的心能沉得下来,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对学术的执著追求。我自己有太多想做而一时还做不完的事,能够寄希望于他,感到很大的欣慰。

袁行霈

1997年8月16日

于密云水库之畔

③

序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提 要

开拓与新变是中唐诗歌的主要创作趋向。本文即以此为题,试图在中唐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对中唐诗歌的总体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作一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绪论部分,强调中唐诗歌在中国诗史中的重要地位;并通过对盛唐诗歌的简单回顾,指出中唐诗人所面临的“极盛难继”的困境,以及诗歌创作开拓新路的必要性。

第一章阐述中唐诗歌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首先考察了中唐的社会风气及其成因。政治之险恶、世风之谬戾、人情之淡薄,促成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其次说明广泛传播的宗教思想与宗教文化在冲击儒学传统地位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指出,古文的复兴,传奇、变文的兴起,词由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的过渡,书画艺术的发展等,对中唐诗歌的发展趋势所起的作用。

第二章重点论述中唐诗人的创新精神,以及中唐诗歌众多的流派与风格。尽管创新求变的方法、途径不同,但诗人们主观上的追求是一致的。中唐的社会背景(如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科举考试的弊端以及用人制度诸因素),为诗人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也促使不同群体形成风格各异的诗歌流派。

第三章对盛唐与中唐诗人的审美趣味、诗歌的情感基调、气象境界、艺术风貌做了广泛的比较,并由此说明中唐诗歌新变的主要特征。

中唐诗歌以徘徊苦闷、哀怨惆怅、凄凉感伤为基调;气象内敛,意境狭窄。中唐诗人或雕琢炼饰,追求丽藻与远韵的统一;或崇俗尚质,追求浅切尽露的平易之风;或崇奇尚怪,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这都与盛唐诗歌形成鲜明的对照。

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皎然在理论上的明确倡导,强化了向齐梁回归的趋势。刻意追求诗歌艺术的新变,是齐梁与中唐这两个时期诗人们的共同之处。然而中唐诗人模仿齐梁却不为齐梁所囿,如王建的《宫词》、李贺的乐府,都能创变出独具中唐特色的风格。

第四章集中论述宗教对中唐诗歌新变的影响。中唐时期流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许多文人,包括以道统自居的儒者,都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与宗教文化的熏染。本章从宇宙与人生,心性与神思,禅玄与意境,直观与幻象四个方面,说明宗教不仅直接影响了诗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他们有机会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宇宙、人生和自我,而且也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诗歌在艺术想象、艺术构思、意境的构成、艺术形象的创造等方面,都具有新颖奇异的特点,从而有别于盛唐。

总之,中唐诗人在时代氛围的孕育中,以异乎寻常的胆识与魄力,打破了“极盛难继”的困境,在盛唐诗歌之后,开创了新的途径,展示了新的美学风范,为诗坛带来了“再盛”的局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绪 论

清代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衍和沈曾植,曾指出我国诗歌发展中的三次巨变,即所谓“三元”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云:“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沈曾植则易开元为刘宋之元嘉。^①二人识见不尽相同,但对“中元元和”都十分重视。“三元”说的提出,固然与同光体诗人“不专宗盛唐”^②并在艺术上模仿江西诗派的作风有关;但以创新求变为突出特征的中唐诗歌,特别是元和诗歌,不甘落盛唐之窠臼,另辟蹊径,体现出“中唐之再盛”^③的繁荣局面。

宋代赵孟坚《凌愚谷诗集序》云:“文章至唐而体备,其情态宛委,肌理丰泽,腴而密,婉而丽,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贞元、元和而上,李、杜、韩、柳以至乎长庆元白,皆唐文之懿也。大中以降,琐涩滋过,固一病也,而又浸淫于以俗为雅之流,代号作者或不免是,况浸淫于末流者乎!”^④显然,在赵氏看来,贞元、元和以至长庆,均处于繁盛之中。宋代的理学家杨时,更加推尊以元和为主的中唐诗:“诗自河梁以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⑤明代胡应麟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唐诗人之盛的局局:“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今人概以中、

① 见《海日楼札丛·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7月第1版。

② 《石遗室诗话》,192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③ 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④ 《彝斋文编》卷3,引自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8月第1版。

⑤ 《龟山先生语录》,见《四部丛刊续编·子部》。

晚束之高阁。若根脚坚牢,眼目精利,泛取读之,亦足充扩襟灵,赞助笔力。”又:“东野之古,浪仙之律,长吉乐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过人。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① 清人叶燮对中唐诗的价值和意义作了更高的提炼,他在《唐百家诗序》中说:“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断。”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唐诗人及诗歌在后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中唐诗人的新创造,不仅直接开启晚唐,而且从北宋的江西诗派直到清末近代的同光体诗歌,都多少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因此,对中唐诗歌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能为我们进一步把握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一些具体可靠的依据,而且能进一步发掘和丰富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为当今和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盛唐诗歌的成就,以见中唐诗人所面临的“极盛难继”^② 的困境。唐代社会经过了近百年的和平安定与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诗歌也达到全面繁荣的地步。好像是一个奇迹,在短短的五十余年间,涌现出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各不相同的风格,投入了诗歌创作的高潮。正如李白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③ 昌盛的经济文化,强大的国力,不仅开拓了他们的视野,陶冶了他们积极向上、乐观豪爽的性格,而且也滋长了冲破传统追求解放的精神。可以说盛唐一代诗人,怀着宏伟的理想,以蓬勃热烈的情感、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讴歌那个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盛唐诗人很少有低沉、纤弱和颓废的情绪,尽管他们也写离愁别绪,也写失意悲慨,也写山水田园,也写纵酒狎妓,但总有一种壮大的气魄。林庚先生曾指出,他们“无论是快乐或是痛苦,都是爽朗的、健康的,永远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光明的展望”,“这些就是所谓真正的

① 《诗数·外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

② 《诗数·内编》卷5。

③ 《古风》其一,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2,中华书局1977年9月第1版。

盛唐之音了”^①。那种追求进步政治的理想、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以及傲视王侯、反抗权贵的精神,乃是盛唐诗歌的主流。“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③之积极乐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⑤之昂扬奋发;“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⑦、“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⑧、“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⑨之壮怀激烈,均代表了盛唐的时代精神。即使像孟浩然也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⑩这类气势磅礴之作。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正说明了这一点。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又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也。”这段话准确地指出盛唐诗歌阔大、明朗、玲珑、自然之美。

盛唐诗人既有统一的昂扬的基调,又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若王湾、贺知章、张旭、张说、张九龄之洒脱自然,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崔国辅、常建、丘为、裴迪之宁静明秀,崔颢、王昌龄、李颀、薛据、崔曙之清刚峻爽,王翰、王之涣、高适、岑参、祖咏之壮大雄浑等,皆情思浓烈,韵味深厚,境界壮阔,骨气峻爽。李白诗的飘逸之气,凝聚了盛唐诗歌的精神风貌,兼有豪壮雄浑与清新明秀二者之美。杜甫之诗,“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⑪。

①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210页。

② 王湾《次北固山下》,见《全唐诗》卷115,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③ 王之涣《登鹳雀楼》,见同上卷253。

④ 李白《上李邕》,见《李太白全集》卷9。

⑤ 杜甫《望岳》,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⑥ 王维《观猎》,见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新1版。

⑦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见《全唐诗》卷143。

⑧ 高适《塞上》,见同上卷211。

⑨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见同上卷199。

⑩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见同上卷160。

⑪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卷56。

盛唐之诗诸体悉备,皆臻妙境。王维众体兼长,孟浩然五言最美,储光羲工于五古,高适、岑参尤以七言歌行为佳,王之涣擅长绝句,李颀长于七古,王昌龄有七绝圣手之称,李白长于乐府、绝句、妙绝古今,杜甫众体兼长,五七言古体律诗绝句,无不运用自如,而于七律贡献尤为卓著。杜甫还开创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为诗歌反映现实开辟了一条方便的途径。

短短的五十年间的盛唐诗坛,名家辈出,各展风采,杰作如林,光华闪烁;题材丰富,内容充实,风骨峻爽,情思浓烈,气象雄浑,境界壮阔,韵味悠远;诸种诗体臻于完善,艺术技巧达于圆熟,尤其是诗歌意境的创造,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充分展示出盛唐诗歌所特有的美学风貌。盛唐诗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已经达到诗国辉煌的巅峰。然而这一切,毕竟是盛唐人的骄傲。这对于继踵其后的诗人们来说,却是极大的不幸,“极盛难继”的局面,使中唐诗人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通变,是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既要对前人有所继承,又要有新的创造与发展,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健旺的生命力。如果“通”而不“变”,则是纯粹的复古,势必窒息艺术的生命。因此,皎然《诗式》卷五“复古通变体”谓: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骛骖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类,置于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玉璞,岂知周客咻嘲而笑哉?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忧神沮,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太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宜其戒之哉。

皎然所反复强调的,关键就在一个“变”字。盛唐过后的大历诗人中,

就不乏效盛唐诗人之声吻、情性乃至字句者,然其结果却是“诗道初丧”^①，“气骨顿衰”^②。皎然在当时提出“复忌太过”和“变若造微，不忌太过”的主张，正是看到了当时不得不变的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对于开、天以后的诗人来说，言“变”谈何容易！他们不得不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寻找一条适于自己时代的诗歌发展的新途径。叶燮《原诗·内篇》曾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说：“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诗歌发展的盛衰更替，也是符合于一般规律的。历开、天巅峰之后，诗歌创作势必会出现一个相对而“衰”的趋势。而如何走出低谷，由衰而转盛，攀登另一个新的高峰，达到唐诗之“再盛”，这正是摆在中唐诗人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欲另辟蹊径，转衰为盛，就势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叶燮《原诗·内篇》亦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不付出艰辛巨大的努力，就难以改弦更张，转衰为盛。

面对困境，中唐诗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他们的诗歌带有奇变的色彩，但毕竟在盛唐诗歌之后开辟出新的途径，创造出新的美学风貌，呈现出“中唐之再盛”的繁荣局面。

① 皎然《诗式》卷4，见李壮鹰《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3月第1版。

② 胡应麟《诗数·内编》卷4。